

改革,来自智慧原点(上)

◆ 梁建刚

——中国首个保税区创建前后

从保税区到自贸区,见证着中国经济历经数十年建设之后,国内外环境变化与中国经济层级的变迁,更蕴含着我国改革开放至今,转型发展的内在必然。

无论改革、发展抑或创新,万事皆需从无到有,从头起步,但所有宏大历史的背后,总有前因后果,如草蛇灰线,贯穿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区落户在这里,并非偶然。

回眸,品味历史的细节,那些破解难题、开拓创新、令人叫绝的经验与智慧,对当下与更久的未来,仍不乏启示。

起名

细心的人不难发觉,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翻译名为“SHANGHAI WAI GAO QIAO Free Trade Zone”,意思是外高桥自由贸易区。这与今天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颇为相近。

实质亦相仿,少有人知的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之初心目中的设想,就是按照自由贸易园区来建设的。

“当年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提出要在内地再造十几个香港的设想。当年创设外高桥保税区本身就是基于浦东开发和上海这个国际性大都市需要一个自由贸易园区(自由港)来支持考虑的。只是在当时的规划和前几阶段的发展中,不可能一步到位自由贸易园区。”外高桥保税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胡炜回忆说。

相隔24年,从保税区到今天的自由贸易区,当初的设想终成现实。但当我们追溯至改革的原点,外高桥保税区的这个英文名称的由来,也并不简单。

1990年5月3日浦东正式开发开放,最初的设想,便是由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处功能性区划先

自浦东主干道之一的杨高路一路向东,车行不过20分钟,一道状如彩虹的大门横跨南北,昼夜川流不息的车流上方,是一排鎏金的显眼大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而在更早些时候,大门上的字还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中国首个、规模最大的保税园区。

行。其中,外高桥沿江靠海,保税区意在鼓励进出口贸易;金桥以学习台湾、新加坡经验得来,着重加工制造业;陆家嘴发展金融服务,意在上海市经济中心的地位与价值。

“规划先行”,在规划中,“功能规划”又必须领先于“形态规划”,这是浦东发展之初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在功能规划完成后,围绕三个片区的三家开发公司由此而起。

但与其他两家不同,对外高桥来说,首先让人头疼的就是英文名称翻译问题。“保税区”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名词,在国际上,通行的是 free zone(自由区),free port zone(自由港区),bonded port(保税港区),bonded house zone(保税仓库区)。而国际通行或使用最多的称谓是 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

几经讨论,外高桥先把国家给予的政策做了下归纳,可以说,主要就是“三个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口自由。

经过分析讨论,大家都觉得当时的贸易自由,对保税区意义最为重大,最重要。这是对当时严格贸易

管制的一个突破。保税区是外国资本唯一可以设立贸易公司的地方。

权衡几番,外高桥保税区最终将英文名定为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翻译,从对外宣传、与国际接轨等方面都有利,很容易让人接受。”报上去后,当时浦东开发办的几位领导杨基昌、沙麟、黄奇帆,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都觉得不错。

于是,名字定下来了。甚至还有人提出,是否将外高桥保税区的中文名,也改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但朱镕基想了很久后,还是叫秘书打电话来通知说,中文还是不要改了,就叫保税区。

1990年9月11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式命名。但争议随之而来。1992年9月,外高桥保税区正式通过验收后不久,第一次全国性保税区工作大会在天津召开,会上上海提出了“三个自由”的特殊政策,以及要抓住贸易作为突破口,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保税区的建议。

这一主题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在当时“自由”一词还较敏感的时期,是否

能将“三个自由”的提法用其他词汇替代。有人还提出反对,应当准确翻译为 bonded warehouse zone(保税仓库区)。

随后发言的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力挺上海代表的观点,借助大量案例一再表示,自由贸易区并非免税,而是暂时不征税,主要是按照国际惯例让货物自由进出,接轨贸易全球化,使上海发挥类似香港那样的国际自由港功能,同贸易保护主义相对……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保税区的“三个自由”特殊政策。在这个会议之后,全国所有保税区的英文翻译,都变成了自由贸易区。

启用

1991年,外高桥保税区正式开始建设。开发建设的人们到了这里,看到的只有遍地碉堡、农田和芦苇荡,唯一可看的是当地的友好小学,这座相邻杨高路的三层小楼,是唯一可以作为保税区临时指挥部的地方。建设,只能从零开始。规划的10平方公里,最初规划启动的只有0.7

■ 最初的保税区就是一片荒
芜的农田



平方公里。但就这么点地方,也有麻烦。作为开发区,保税区需要完全封闭,除了动迁,还需要用铁丝网将整个开发区围起来,才能实现“境内关外”的设计初衷,通过海关验收后,才能享受优惠政策。

一年的建设,临近验收前,分管保税区的赵启正副市长提醒,应当让海关来提前验收一下,结果竟又发现了问题。

作为海关监管区,海关规定铁丝网的高度应为3米。开建时,外高桥以当时的杨高路为基准,杨高路海拔标高4.2米,以此为基准再向上修建铁丝网。但到了1992年临验收前,新的杨高路建成,标高一下变成了4.5米,保税区的铁丝网一下比要求矮了30厘米。海关当场就提出了异议。少了30厘米,人一样爬不进去,但不管怎样,与国家规定有了差异。几乎没有商量,外高桥的建设者们保证,一个礼拜达到要求。

事后,赵启正曾对外高桥的负责人表示,外高桥的举动,树立了非常好的信誉,获得海关方面的好评,保税区的隔离设施都建得这么认真,以后对国家的政策法规执行也会同样认真。这反映了我们对国家规定、海关规定是不折不扣执行的,让国家放心,上海的保税区不是走私区,是海关的监管区。

1992年3月10日,外高桥保税区正式通过了由海关总署和上海海关组成的验收小组的验收,第一期面积0.453平方公里的保税区域正式启用了。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香楸。

“克雷尔号”飞机在爱尔兰利默里克郡福因斯村的香农湾着陆,在那里,多诺万和指挥一支爱尔兰分遣队的年轻中尉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你准备好面对侵略者了吗?”善战的步兵第69团指挥官问道。“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年轻的爱尔兰人回答道。从福因斯村,飞机横跨大西洋,依次飞过加拿大的博特伍德、纽芬兰和魁北克的布谢维尔。星期天晚上稍早,“克雷尔号”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上空盘旋了两次后,降落在鲍厄里湾的水面上,然后滑行至海军码头。和旁边闪闪发光的银色飞机比起来,“克雷尔号”飞机深色的油漆让它了无生气,但是它自豪地身披英国国旗。多诺万是“克雷尔号”飞机上唯一的乘客,其他两位乘客已在加拿大下了飞机。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两名在码头迎接多诺万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和一群新闻记者。多诺万拒绝回答记者对本次出访的问题,仅说他执行弗兰克·诺克斯的一项任务。多诺万强调:“我出国是代表海军部长,你们必须去问他。”

正当多诺万返回美国时,另一位有名的美国上校,查尔斯·林德伯格在芝加哥的“士兵场”体育馆向四万名欢呼的群众讲话,这次聚会是要表示反对参与欧洲的战争。备受欢迎的林德伯格认为,如果德意志帝国赢得战争,我们必须和德意志帝国寻求合作。“在过去,”他说,“我们和英法主导的欧洲来往。在将来,我们可能不得不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来往。”次日,在海德公园与亲信就餐时,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林德伯格的讲话是令人担忧的发展态势。他说:“这事很严重的。”

多诺万直奔华盛顿向政治领导人汇报他的结论。8月5号星期一早上,他和弗兰克·诺克斯磋商了一个小时。当晚,海军部长在“巨人杉号”游艇上举办了晚餐会,让政府官员们可以同时听到多诺万和先期回来的埃德加·莫勒的报告。诺克斯回忆说:“两份报告都特别有趣,我们晚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非常令人长见识。两个人都带回了非常有用的信息……比尔和埃德加都倾向于认为英国能够击败可能的人侵。他们认为英国士气高昂但英国的设备短缺。”

36.日子同样不好过

布朗先生绝对想不到,他这一招招给他日后脖子上套上了一条绞索。调来4条客轮后,加上英法公司原来的两艘,客轮公司的两艘,仅仅140海里的申甬航线居然有八艘客船对开。这次,客轮公司的船票没有跟进,仍然维持3角。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客轮的3角船票,上客率居然与英法的1角船票差不多。这让布朗大惑不解:这宁波人怎么啦?怎么放着便宜不占?布朗哪里知道,为了争取客人,阿祥他们已经用足了脑筋,比如实行送票上门,到客人家里帮着搬运行李,对年老的旅客送到家里等等。布朗现在在两难了,他不知道宁波人还可以坚持多少时间,如果再坚持——不用多,只要再坚持3个月,他只能退兵,英吉利即便实力再强,也抵挡不住像漏斗一样巨大的亏损。布朗觉得他不能再耗下去了,于是请示伦敦,撤掉了4艘轮船,留下的2艘轮船票价回到五等船票3角价格。其实,这段日子,阿祥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低价运行的亏损已经不堪忍受,而每天上门来的那些小股东更是让他无法面对。

上海老城厢从早到晚一贯是喧闹的。临近傍晚,小东门城墙内,东街宝带弄周边闹哄哄的,那些做生煎馒头、炸臭豆腐的,煮牛肉细粉汤的,卖馄饨的摊贩们高声吆喝的声音,形成了城市市井特有的喧哗。傍晚时分是小东门最闹猛的时候,那些来自南北沿海各码头的船只靠上码头,抓紧时间把货物卸下,是鱼货的赶紧发送到咸瓜街,是其他货物的发到沿江货栈。常年漂泊在海上的船员很懂得享受,一次海上走下来,天天在茫茫的海上闷得慌,等到船靠岸,当然需要调剂调剂。于是,船员们三五成群,结伴来到东街宝带弄一带,他们在小饭馆点上几个菜,烫上一壶酒,有滋有味吃起来。当然,有钱的船主是不到小饭馆的,他们会选择到码头边的德兴馆,那是一家较有档次的饭馆,环境和菜肴当然不一样了。船主们在那里,吃吃喝喝当然重要,但不是他们上那里的全部目的。他们在德兴馆还有个重要内容,就是谈生意。

张才发的家就在东街,在一片旧的老房子群中,张才发的房子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

最初到上海,张才发在姐夫带领下来上海落脚,那时他连日的老房子都没有,只能借住在三牌楼姐夫郑瑞康家里。姐夫一个人在上海,家里房子很小,就那么一间,本来姐夫一个人住还马马虎虎,现在加上他这个妻舅,只好让他打地铺了。虽说是姐夫小舅子,但是两个大男人住一间房里终究不方便。住了一段时间,才发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这才住得自由了些。

那天晚上,才发与姐夫约定,请姐夫到他家吃老酒。天还没黑,姐夫就来了。瑞康是镇海十七房郑家后人,他没有读过书,打小时候就跟着族人到上海一家机器厂学生意。瑞康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绝对聪明,现在瑞康是机器厂技术老轨,随便啥机器,他只要听听声音就知道毛病在哪里。

才发和姐夫坐下吃老酒,话题马上转到宁波轮船竞争事情上。才发说,他现在已经了解,这大半年客轮公司已经亏损了10多万元,算一算,他们的投资也缩水近三成。才发说这个话的时候,虽然没有责怪姐夫的意思,但是瑞康已经听懂了。当初客轮公司发行股票,才发本不想投资,是姐夫让他投资的,当时,姐夫投资了200大洋,一味规劝才发投资,说这个股票应该赚钱。就是听了姐夫的规劝,才发一发狠,拿出大半积蓄,投资了3000大洋,还成了小股东代表,被选为董事。

“才发弟你后悔了是不是?依这个做生意的人,还不如我做这个做生意的人活得住气,依不要不信,我可以判断,这个股票快到转弯展光了,过了年就马上可以有赚头!”瑞康吃着酒,肯定地对才发说。“可是现在,我已经亏损快1000大洋了。”才发心痛地说。“做生意嘛,暂时亏损有啥啊,依我在上海滩多年的观察,这种事体在上海滩一点点都勿稀奇。”瑞康还是信心十足。“姐夫,我也相信依的闲话是对的,但到底是1000块大洋,我这并酱园店做3年赚头也不到1000大洋啊。”才发还是心痛。“阿弟啊,勿是我讲依,我实在拿不出3000大洋,假使我拿得出,依的股票转拨我好了,依假使还要后悔,现在转让给我500大洋股份,我只能拿出这点。”瑞康说。“姐夫,我不是这个意思,依亏本与我亏本有啥两样,我是有些心痛啊。”才发说。

宁波商人

徐志明

